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2003年12月，頁139~189

BIBLID1012-8514(2003)32p.139-189
2003.6.19收稿，2003.10.13通過刊登

從「經世」到「經濟」
——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

金觀濤　劉青峰*

提要

「經濟」一詞在中文裏原意為「經世濟民」或有關「經世」的才能，它包含儒學特殊的經濟觀，就是將道德規範的約束視作社會組織原則。中國近代之所以用「經濟」一詞來指涉 economy，與儒學將經濟關係隸屬於道德秩序這一傳統思維模式密切相關。新文化運動前期（1915~1919），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即社會由獨立自主的個人通過契約組成。在這種社會組織原則中，經濟秩序與道德秩序的關係不那麼密切。正是在這一時期，「經濟」一詞與道德脫離關係，獲得了今天中文「經濟」一詞的含義。但當時中國正面臨引進西方代議政治的失敗以及現代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社會普遍的生計危機。這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放棄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把社會看作由獨立個人根據新道德規範組成；這是五四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的思想史內部原因。

本文通過對一八三〇至一九二〇年間近七千萬字政治思想言論中「經濟」一詞的意義分析，揭示出中國知識分子經濟觀的變遷。我們發現，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被中國知識分子廣泛接受，是與他們把社會視為由道德規範組成的思想模式密切相關。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過程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在西方興起存在著共同的機制。

關鍵詞：中國近代思想史　比較觀念史　社會組織原則　經世　經濟

* 金觀濤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劉青峰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一、「經濟」一詞所包含的歷史悖論
二、社會生計與「經濟學」
三、在經濟決定論的背後：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批判
四、從「經世」、「富強」到「經濟」
五、「民生主義」和「經濟學」
六、紳士公共空間和「生計學」
七、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組織藍圖的巨變
八、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前提之一：
共和的失敗和對民主的再定義
九、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前提之二：
社會生計困境和工讀互助團的失敗
十、剩餘價值說、列寧主義和唯生產力論

一百五十年來, 經濟決定論的本質一直處於科學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濃霧之中, 它或者被認為是科學主義的歷史決定論, 或者被理解為某種物質決定論;其實經濟決定論的興起意味著人類對社會組織原則認識之改變, 它是現代社會危機或社會現代轉型失敗的結果。

一、「經濟」一詞所包含的歷史悖論

在西方近現代政治文化傳入中國過程中, 有兩個例子最能反映文化對翻譯的巨大影響。一個例子是將science譯為「格致」, 另一個則是將economy譯為「經濟」。「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簡稱, 用於指涉science, 明確表示將西方意義下的認知納入儒學修身八條目的軌道。「經濟」一

詞的中文本意是經世之才幹或經世濟民，是儒生常用詞彙，用它來指涉economy，同樣刻劃了把西方研究生計的經濟學科如何道德化，成為儒學經世致用實踐的一部分。然而，十分有趣的是，這兩種譯法在中國近代的命運完全不同。一九〇一年清廷的新政掀起了中國社會第一次現代化高潮，在大規模引進西方制度前提下，很多重要的西方價值和觀念開始與儒家道德劃清界線，如「個人」、「權利」、「社會」、「公理」等詞的普遍使用。正是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不再使用「格致」而改用「科學」來指稱science。但是，「經濟」這個詞用法的變遷過程，卻恰恰與「格致」相反。

早在洋務運動時期，西方現代經濟學已經傳入中國，一八八五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幾乎就是一本鼓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著作。在這本書中，economy音譯為「伊哥揶謎」。[1]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系統地論述中國為了達到富強的目標，就必須引進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經濟是該書討論得最多的議題，但鄭觀應在用「經濟」這兩個字時，其意義仍是傳統的經世濟民，他寧可將學習西方經濟事務歸納在「商戰」的名目之下。[2]在甲午後洶湧澎湃的戊戌維新運動中，一八九六至一九〇二年間，嚴復開始著手翻譯重要西方經濟學著作，他把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譯作《原富》，可以說是相當準確地抓住該書的本質。但嚴復並沒有將economy譯為「經濟」，而是創造了「計學」這個詞。嚴復認為日本用「經濟」譯economy過於籠統，而儒學的經世濟民是不能用來指涉西方經濟科學的。[3]

---

1 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第 156 節，56。

2 鄭觀應，《盛世危言》（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238~266。

3 嚴復在《原富》的〈譯事例言〉中指出，日本將其譯為經濟，中國譯為理財。「……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於地方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原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上冊，7。

早在江戶時代，日本「經濟」一詞的使用就淡化了道德色彩，因此，最早用「經濟」來翻譯economy，可能在明治維新時期。[4]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留日學生把「經濟」一詞帶回中國之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已用「西學經濟」來泛指現代工商軍事等才能。[5]一九〇一年清廷開始實行新政，宣布開設「經濟特科」，在科舉考試中選拔精通西方事務（包括經濟學）的人才。[6]一九〇五年以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用「經濟」來指涉economy。為甚麼就在「格致」演變為「科學」的同時，「伊哥揶謎」和「計學」卻被「經濟學」取代了？表面上看，這正好證明這一段時間日本著作的翻譯對中國知識分子現代用語的巨大影響；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去探討中國文化接受外來觀念的思想史內部因素，就可以發現兩者為完全不同的意義所支配。由「格致」變為「科學」意味著有關自然界的學術研究和儒家倫理脫離關係，它是一個譯名非道德化之過程。甲午前，經濟學的中文譯名十分多樣化，大多是非道德的，如「伊哥揶謎」、「生計」等；但隨著現代化的展開，有濃厚道德含意的「經濟」一詞逐漸取代了「生計」，成為economy的翻譯名詞，這個譯名反映了某種觀念的道德化過程。為甚麼在清廷新政實行過程中，兩者會呈相反的趨勢？顯然，這涉及到思想史內部未曾注意的問題。

一九九七年以來，我們通過推行一系列研究計畫，建立中國近現代觀念演變的專業數據庫。[7]本文通過對數據庫中economy這個詞的中文譯

4 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早在太宰春台（1680~1747）的《經濟錄》中經濟這一觀念雖然仍帶有少量的儒家道德實踐意義，但已具有重商主義內容，相當接近近代西方 economy 的內涵，參見武部善人，《太宰春台》（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太宰春台是徂徠的學生，我們知道早在徂徠學中已具備將國家政治和道德分離之構想，因此在日本最先用「經濟」指涉 economy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5 張之洞，《勸學篇》二，載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2 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49~9750。

6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 482，9，總第 4439 頁上。

7 這一系列研究計畫如下：一九九七年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CUHK4001/97H)”；二〇〇〇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的“An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n Modern China 1736~1927(RG018-D-99)”；二〇〇二年四月香港中文大學資助的“Data Mining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La Jeuness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Important Incident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二〇〇二年九月開始香港研究資助局（RGC）資助的新研究計劃“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a's Selective Absorption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and the Origins of Certain Key Concepts (1840~1915) (CUHK4006/02H)”。謹此致謝。

本文根據如下兩個數據庫作出有關統計：「中國近代思想史數據庫（1830~1915）」（以下簡稱「數據庫一」）和「五四時期思想史資料庫」（以下簡稱「數據庫二」）合共約六千四百萬字。數據庫一包含（每部著作在括號中表明之字數以千為單位）：

A 傳教士中文著譯（共 171.4 萬字）：

丁韙良譯，《萬國公法》（100）；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80）；林樂知、蔡爾康編，《中東戰紀本末》（783）；李提摩太等譯，《泰西新史覽要》（310）；《萬國公報文選》（441）。

B 中國民間及官方文獻（共 5816.7 萬字）：

I. 重要政論選輯：

《皇朝經世文編》（賀長齡、魏源編，2767），《皇朝經世文續編》（葛士濬編，1888），《皇朝經世文編續編》（盛康編，3344），《皇朝經世文統編》（邵之棠編，4215），以上四種約一千二百萬字；張楠、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2111）。（以上 14325 千字）

II. 重要論著集：

徐繼畬，《瀛寰志略》（130）；魏源，《海國圖志》（1030）；許楣，《鈔幣論》（16）；馮桂芬，《校邠廬抗議》（55）；王韜，《弢園文錄外編》（200）；薛福成，《籌洋芻議》（23）；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120）；鄭觀應，《易言》二十卷本（24）、《易言》三十六卷本（76）、《盛世危言》（140）；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320）；宋恕，《六字課齋卑議》（30）；容閎，《西學東漸記》（63）；黃遵憲，《日本國志》（1000）；康有為，《孔子改制考》（272）、《新學偽經考》（287）、《實理公法全書》（18）、《大同書》（200）；譚嗣同，《仁學》（56）；《嚴復著譯集》（250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7000）、《西學書目表》（7）；張之洞，《勸學篇》（45）；陳天華，《警世鐘》（26）；劉師培，《攘書》（34）；章炳麟，《訄書》（90）。（以上 13762 千字）

III. 官方文獻：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2000）；《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2100）；《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2200）；《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含光緒、宣統兩朝，王彥威、王亮輯，4116）。《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800）。（以上 11216 千字）

名術語的變化及相關詞彙的計量分析，並對照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興起的過程，來探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社會組織原則幾番轉變，解釋為何現代漢語用「經濟」譯economy的思想史意義，以及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機制。

二、社會生計與「經濟學」

為了使本項研究具有中西思想變遷比較的宏觀視野，在探討社會組織原則變化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傳入中國的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花少許筆墨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興起的思想史過程。

首先必須指出，在西方傳統思想中長期存在經濟生活和政治活動無關的看法，這是十九世紀經濟決定論興起後難以想像的。考察economy這個詞的本來意義，可以證明這一點。在西方，economy這個詞來源於古希臘，其原意是「家計」（oeconomia）。亞里士多德在《家政學》一書中明確指出，它是與城邦政治學不同的另一門學問——oikonomika。在書的一開頭，亞里士多德就指出家政學和政治學的不同。首先，「家政學先於政治學而產生」，而且「家政學有別於政治學，正如家庭之別於城邦」。他進一步指出：「政治學涉及眾多的統治者，家政學只涉及唯一的管理者。」[8]既然家政學先於政治學，似乎很容易得出經濟是政治

IV. 近人選本：

翦伯贊、劉啟戈等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 2、3 冊（791）；鄭振鐸編，《晚清文選》（870）。（以上 1661 千字）

V. 近代期刊：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361）；《六合叢談》（101）；《格致匯編》（2427）；《時務報》（2200）；《知新報》（3800）；《庸言》（3100）；《大中華》（3500）。（以上 15489 千字）

「五四時期思想史資料庫」則包含五四前後有影響力的報刊，暫時已入庫的有《新青年》（5560）。

8 亞里士多德，《家政學》，載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

活動前提的看法；但亞里士多德並不這樣認為。他十分明確地將家計限定在家庭之內，把家庭生計活動與家庭以外的政治活動劃分為兩個不相干的領域。亞里士多德指出：「財產是家庭的一個部分，獲得財產的技術是家務管理技術的一個部分。」[9]與此同時，他否定家庭以外的經濟活動的正當性。他這樣論證：

> 有兩種致富方法，如前所述，一種為家務管理的一個部分，另一種是零售貿易；前者是必須的、體面的，而由交換構成的後者則應受到指責，因為它是不自然的，而且它採用的是一種從他人處獲利的方式。[10]

可見，亞里士多德把正當的經濟活動嚴格限定在家庭範圍，其功能是維繫家庭存在；超出家庭之外的經濟活動被認為不自然，甚至是不道德的，它自然也不可能與政治活動有甚麼關係。這種見解是基於當時被普遍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將其概括如下：「根據希臘人的思想，人類的政治組織能力不僅不同於家（oika）和家庭為軸心的自然關係，而且還直接地與之相對立。城邦的興起意味著除了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外，人還接受了第二種生活，即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11]到了中世紀，雖然希臘羅馬式的城邦政治生活不再存在，但政治領域和家庭生計領域仍是互相分裂的。

眾所周知，與西方明顯不同，中國傳統社會將國家看作家庭的放大，家庭和國家（政治）從未被明確分成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在這種組織方式中，人們清楚意識到政治文化和家庭生計的互相依賴關係。梁啟超早就注意到，在眾多學科中，唯獨生計（經濟）學這門學科在古代中國比西方發達。[12]他認為早在秦漢時期，關於稅收、理財、鹽鐵、貨

學出版社，1994），卷 9，289。

9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載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卷 9，8。

10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22~23。

11 阿倫特（Hannah Arendt），〈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載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57。

12 梁啟超在將先秦思想與希臘比較時，把「生計（economy）問題之昌明」視為中國先秦

幣，中國有比古希臘羅馬更豐富的論述。現在，我們考察一下中文中「經濟」這個詞的來源和意義，就很容易發現它和西方家政的不同。歷代「經濟之學」、「經濟」等詞，或被用於指涉「經世濟民」，或用於指涉治國才幹，如《朱子語類》中有如下句子：「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13]又如《海運芻言》所云：「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實經濟者。」[14]「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縮寫，無論用於指涉人的活動還是人的才能，都包含著如下環節：首先是「經世」，它的意思是落實儒家倫常所規定的道德規範，建立一種與之相符的、整合社會各層次的秩序；「濟民」則指在社會整合過程中解決百姓生計。在傳統中國，政府應推行仁政，解決億萬家庭生計問題，而這又取決於社會是否建立了正常的道德秩序。任何生計危機和民眾的流離失所，都可以歸結為理想道德秩序被破壞。

上述道德政治籠罩下的經濟觀之所以能在中國傳統社會長期發揮作用，是由於儒學提供了頗為獨特的社會組織原則：一個正當的社會必須是根據倫常等級和相應道德規範組織而成。我們曾論證過，自秦漢帝國建立以後，中國傳統社會是由上、中、下三個層次整合而成。上層是以王權為核心的大一統官僚機構，中層是縣以下紳士鄉村自治，下層為宗法家族組織。這三個層次能夠良好整合，則是依靠儒家意識型態的功能。[15]儒家倫理將忠看作孝的延長，「國」是「家」的同構放大，並主張由信奉儒家倫理的知識精英對鄉村實行統治。這種社會整合方式使得整個社會被理解為一個根據君臣、父子等綱常等級組成的有秩序結構。只要人人依照儒家倫理原則行動（即做到所謂「理分」），就能形成井然有序的社會。而要維繫這種倫常等級秩序，就必須去人為地創造或維

學術優於希臘之長處。見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第3冊，文集之七，32。

13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36，3249。

14 《漢語大詞典》（武漢：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87）。

15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27~32。

繫一系列經濟條件，如自耕農為國家提供足夠的稅源，地主經濟保證紳士對鄉村的自治，族田提供宗族家庭教育和公共活動的種種費用，等等。在這種由倫常等級組成的社會圖像中，只要綱常等級規定的道德秩序存在，經濟活動就能自動運行並維繫社會的穩定。[16]

在中國歷史上，也經常出現社會生計問題，但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和家族通常都能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調控手段解決這些困難。[17]這些調控手段的失靈，大多發生在一個王朝末期。那時，土地兼併嚴重，吏治腐敗，農業凋敝，商業和城市病態繁榮；失去土地的農民無以維生，終於爆發改朝換代的大動亂。[18]根據由儒家倫理的社會組織原則，正常的秩序等同於道德規範之實現；而社會危機特別是民眾生計困境的原因，則是由於君王失德、官僚機構腐敗和政府沒有實現仁政，即社會秩序偏離了儒家理想的道德倫理秩序。[19]因此，解決生計問題的方法必定是經世濟民，它是一個重整社會道德秩序的過程。這裏，道德倫理始終是「因」，而生計問題是「果」；經濟生活由道德政治決定。

三、在經濟決定論的背後：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批判

從思想史上講，西方要到十七世紀前後才發現經濟和政治、道德之間的關係，它與現代社會興起同步。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本質區別在

16 金觀濤，〈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收入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7~13。

17 例如政府在糧荒出現時進行救濟，或在豐年時收購糧食在荒年時低價賣出，並通過紳士和家族組織、義倉等等民間自助方式救濟。參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54、51、35。

18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92~96、115~118。

19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32~40。

於，它將社會視為由獨立的個人根據契約而組成的，我們稱其為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現代社會組織原則是建立在自然權利（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一核心價值之上。隨著十七世紀個人權利觀念在西方的興起，社會組織逐漸被想像為由獨立自主的個人根據契約組成。個人交出部分權利形成政府的公共權力，這是政治統治合法性的根據；而獨立的個人用自己擁有的產品（或勞動力）與他人交換，以解決生計問題，構成了市場經濟的正當性。隨著啟蒙運動的展開，到十八世紀，人們普遍接受這一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在這種組織原則中，社會是由人根據某種目的（商業的、政治的、文化的）自行組織起來的系統，需要注意的是，這正是「社會」這個詞的本來意思。[20]這可以解釋為甚麼有關人的生計之科學「經濟學」的誕生與「社會」的興起恰好發生在同時。[21]

這時，經濟學的內容就不再是如同「家政學」那樣，僅僅探討家庭式的管理和分配財富，而需要首先說明整個社會如何分工，個人向社會提供的物質和勞務與個人需求的關係。也就是說，市場機制使得社會分工和交換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阿倫特曾這樣論證經濟學從家計學中脫胎出來之過程：

> 現在家庭的日常事務必須由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的家政管理機構來進行管理。與這一新發展相應的科學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學，而是「國民經濟學」，或「社會經濟學」，或 volkswirtschaft，所有這一切都意指一種「集體家政管理」。眾多的家庭按照經濟的要求組織在一起，形成一個超人的家庭。我們把這個家庭的集合稱之為「社會」。[22]

十八世紀西方現代社會形成，經濟學隨之成熟。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被公認為是經濟學這門學科正式誕生。熊彼得

20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5期（2000，臺北）。

21 阿倫特（Hannah Arendt），〈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載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74。

22 阿倫特（Hannah Arendt），〈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62。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指出，讀這部經濟學專著時，千萬不要忘記斯密是將其經濟學建立在那個時代普遍認同的哲學基礎上的，他甚至認為自己是天賦自由原則的最早發現者。[23]確實，《國富論》的整個哲學基礎是個人權利和契約論，它的迅速普及，是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如何孕育現代經濟學最佳例證。現代社會組織原則中，合理的經濟、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均從個人權利推出，人的政治和經濟乃至文化關係都來自於個人權利和契約，其表現形式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這裡，經濟、政治和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三者雖然互相關聯，但現代社會組織原則作為一種應然社會之藍圖，在應然世界中講經濟生活決定政治、意識型態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在現代社會組織原則中，不存在經濟決定論。

經濟決定論是十九世紀意識。為什麼要到十九世紀經濟決定論才出現？歷史上，經濟決定論是和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嚴重的社會生計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博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指出，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發生了社會貧富的兩極化，財富快速增長與大量貧民出現同步。一七八五年，英國公布了保護貧民最低生存權的斯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Act）。但濟貧法不僅沒有解決貧困問題，反而因阻礙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貧困化更趨嚴重。十九世紀初，幾乎所有的社會思想家都被以下悖論所困惑：為甚麼在社會財富總量不斷增長的同時，社會大部分人卻會貧困到無法維持生計呢？[24]正是對貧困根源的考察以及提出不同的理論解釋和對策，產生了西方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兩種互相對立的學說。

對貧困問題的反思，迫使人們思考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合理性。如果在這一層面上回答為甚麼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難以維持自己生計的問題，邏輯上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認為現代社會組織原則沒有徹底

23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朱泱、孫鴻敞等譯，《經濟分析史》（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卷1，194~195。

24 博蘭尼（Karl Polanyi）著，黃樹民等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169~201。

貫徹，即工人貧困化是自由市場機制不完善所致；另一種則是從批判市場經濟到否定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博蘭尼詳細地討論了第一種可能性。他指出，自湯生（William Townsend，1828~1892）的《濟貧法研究》（*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開始，到馬爾薩斯（Malthus, Thomas, 1766~1834）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再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經濟學的市場法則逐漸被看作類似於生物學界那樣的自然規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萬能的。這樣一來，斯賓翰連法被廢除，終於形成勞動力市場。[25]十九世紀經濟自由主義是力圖不斷細化和完善現代社會組織原則。

博蘭尼還指出，十九世紀貧困問題的出現，使得「李嘉圖（Ricardo, David，1772~1823）與黑格爾（Hegel, Georg Wilhelm F.，1770~1831）從相對的角度發現了一個社會（society）的存在，這個社會不是受國家之法律支配的，反而是國家受到社會本身之律則的支配。」[26]這促使馬克思發展出另一個經濟學方向：把貧困的根源歸為市場機制本身，即市場實現的分配是不公正的。馬克思指出，在市場出賣勞動的工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生產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這就是剩餘價值說。一旦剩餘價值論成立，它立即質疑個人權利和社會契約論的正當性：當自由的個人在市場中甚至難以維持生計時，個人自主性還能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的最終來源嗎？本來，在啟蒙思想中，平等包含在權利之中，它與個人自主性並不對立。而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政府廢除濟貧法，用強硬的政治手段來建立勞動力市場，維護自由經濟，正好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上層建築無非是維護資本家利益的資產階級法權。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被認為是一切政治制度和價值系統（包括個人權利觀念）產生之基礎，經濟決定論成熟了。從中可進一步推導出歷史上一切階級社會都存在不合理的剝削制度的歷史唯物論。必須注意的是，歷史唯物論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強調經濟活動（物質生產和生活）是政治和上層建築的基礎，它只是對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實然關係的描繪，

25 博蘭尼，《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203~253。

26 博蘭尼，《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203。

沒有涉及合理社會的組織原則；二是剩餘價值論，它否定了自十七世紀來被公認的現代社會組織原則。一旦不承認個人權利（自主性）是政治、經濟制度正當性的最後根據，把平等價值視為應該高於個人自主性，就必須重新界定現代社會組織原則了。

那麼，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是否也有類似西方思想史這樣的前提？如果有，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條件又是甚麼關係？我們的研究，正是從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翻譯economy一詞的歷史考察中，試圖從這個特殊角度勾勒出這一思想演變的線索。

四、從「經世」、「富強」到「經濟」

當一八六〇年代中國開始洋務運動之時，正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力如日中天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出現之際，但當時兩者對中國士大夫似乎都沒有甚麼影響。如前所述，一八八五年西方傳教士將介紹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著作《佐治芻言》（Edited by W. and R. Chambers, *Political Economy*）譯成中文，該書使用了大量有關經濟學的詞彙，如「合同」、「資本」、「公司」、「銀行」、「股分」等，今天仍在使用；[27]並將西方現代經濟學音譯為「伊哥揶謎」。但是甲午前，無人知曉「伊哥揶謎」為何物。[28]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佐治芻言》的廣泛傳閱是在甲午之後，[29]並沒有對之前操辦洋務的官員產生思想衝擊。洋務運動中朝野對西方經濟學的冷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反映了當時士大夫仍然固守由儒家倫理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原則。在他們看來，以市場、經商和興利為主要內容的洋務經濟活動，是與儒家經濟觀

27 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36、39、59。

28 一八八〇年代，王韜的關於變法的議論中頻頻出現「公司」、「保險公司」等詞，可以想見這些詞在當時香港和上海的商界已經在使用。但在王韜的著作中，似乎沒有用過「伊哥揶謎」。

29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17~519。

（如：不與民爭利、重農輕商）互相對立的。洋務運動被大多數儒臣和士大夫稱為「自強」。[30]「自強」一詞很明確揭示出士大夫向西方學習的目的，這就是不反對引進西方器物和發展國防現代化，但它不能與儒學的基本價值相矛盾。自強運動除了國防現代化之外，另一方面還特別強調與民休息，以恢復太平天國運動中被破壞的農業生產。當時清議派對洋務的批評，大多指向其急於施行富國強兵之策可能會加重民眾負擔和干擾傳統社會秩序。

在當時有關富強和商戰的議論中，也可以看到有少數士大夫已經意識到傳統的經世致用不足以抵抗西方衝擊。他們主張將經商、興利作為國策，加入經世致用之中，但仍未將其提高到社會組織原則層面。在自強運動中，強調與economy有關事務時，就是指富強。「富強」這個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已有之，但因同儒家社會組織原則相矛盾，故時有貶意。[31]明末出現的經世思潮中，已經有正面使用「富強」一詞的例子，[32]但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直至晚清西方衝擊真正來臨時，富強觀念（「富強」作為一個常用關鍵詞出現）作為對西方現代國力的描繪開始獲得正面意義。如在徐繼畬的《瀛寰志略》和薛福成的《籌洋芻議》中已經提出「富強」的目標。[33]一八六一年，似乎是馮桂芬最早把「富強」納入經世致用，認為它也是「經濟」的一部分。[34]王韜是最早到過西方的知

30 郭廷以、劉廣京，〈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載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上卷，第10章，531。

31 見表一的例句。儒者中講富論強較多的是荀子，以為欲多物寡則必爭，故其強調富足乃所以止爭，但是他仍認為止爭的根本要圖在「明分使群」（《荀子．富國》，《諸子集成》本，114），即其首先強調的仍是儒家的道德原則。

32 如《皇明經世文編》的主要編輯者之一陳子龍即認為當時「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故須「修兵農而極富強」，《農政全書》凡例。

33 如薛福成謂：「為中國今日計，宜因其機而導之，師老子『善勝不爭』之訓，守孫武『知彼知己』之謀，略細故而昭大信，使之無隙可乘，中國乃得以其暇講求一切富強之具，事固大可為也，時亦大可乘也。」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31。

34 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這樣論證：「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為其

識分子之一，他明確認識到富強與經世的差別，也意識到儒家的經世致用不足以應付西方衝擊。他在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鼓吹變法。變法的內容有「除弊、興利、尚簡、設領使、練水師、設電線、製戰艦、辦鐵路」等等。但王韜並未使用「經濟」一詞指涉這些的經濟活動，而是在頻頻地提及這些洋務事項時，不斷論證「富強」之道理。[35]王韜之所以這樣用詞，原因很清楚：「富強」作為富國強兵的簡稱，它和經世濟民不同，已把學習西方放到重要位置，包括發展工商和市場經濟等內容，不再實行傳統的重農抑商、與民休息政策。雖然王韜的主張對洋務運動沒有實質性影響，但他的著作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在甲午後對戊戌變法及維新思潮卻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王韜還是鄭觀應，都沒有將富強提高到社會組織原則層面。因為一旦在社會組織原則層面討論富強，立即會碰到它與儒家倫理是甚麼關係的問題。王韜似乎意識到這種衝突，但他用對中國政府並未實行重農而只知徵賦的批評，巧妙地迴避開了這一問題。[36]鄭觀應似乎沒有意識到兩者的衝突，他通過西學中源說來證明「富強」與遠古三代理想一致，[37]而「商戰」只不過是在肯定儒家倫理為社會組織藍圖前提之下的國策。因此，我們認為，洋務運動時期，大多數士大夫之所以用「富強」來指涉economy的具體內容，而不採用「經濟」一詞，一方面有譯名傳播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緣於在中文中「經濟」的

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為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光緒丁酉刊本），第62輯，《校邠廬抗議》下卷。

35 我們系統考察了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中的用詞，可以發現其中「洋務」一詞出現了二十六次，「富強」出現了三十七次。而全書「經濟」只出現過十次，均為經世濟民或有關能力的傳統含意。

36 王韜曾這樣為「富強」與「重農輕商」的矛盾作辯護：「即其所言農事以觀，彼亦何嘗度土宜、辨種植、闢曠地、興水利、深溝洫、泄水潦、備旱乾、督農肆力於南宙，而為之經營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賦，催科取租，縱悍吏以殃民，為農之虎狼而已。」王韜，〈興利〉，《弢園文錄外編》，96~98。

37 鄭觀應，《盛世危言》。

本來含義與economy有重大差異並互相排斥。也就是說，當洋務被納入經世致用時，士大夫的經濟活動與重視工商與西方市場意義的「經濟」並不完全一致。

幾種《皇朝經世文編》是晚清儒學經世致用典型文獻，我們統計了該文獻中「自強」、「富強」、「經濟」和「生計」等詞的用法和頻度，做出表一。由其中例句可見，十九世紀上半葉文獻中「富強」尚有負面意義；大約自一八八八年《皇朝經世文續編》開始用「富強」指涉洋務中有關現代economy方面事務起，一直到一九〇一年《皇朝經世文統編》「經濟」一詞在使用中，一直保持其儒學經世濟民的原意。由此可見，在以儒學社會組織原則為主導的文化中，不可能將economy稱為「經濟」。

表一：《皇朝經世文編》有關「自強」、「富強」、「經濟」、「生計」四詞的頻度及例句

年代	名稱	字數	「自強」	「富強」	「經濟」	「生計」
1826	賀長齡、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	278萬	使用頻度：4 例句：「沿海官設碉樓。民修村堡。團練壯勇。均固本自強之計。次第施行。其利可數十年。非如一時戰伐之功。兵撤而事變旋生也。」嚴如熤：〈沿海碉堡說〉《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三兵政十四海防上》	使用頻度：27 例句：「朕承幹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顧炎武：〈墾田均田日知錄〉《皇朝經世文編卷三	使用頻度：33 例句：「觀其十五年之經濟。乘得為之時。優之以才。濟之以剛。猛鷙而立功名。一時廷臣。無出其右。原其意以為舉朝因循玩愒。方且伺隙于我。而我無以肩之。則事必不濟。」林潞：〈江陵救時之相論〉	使用頻度：113 例句：「我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于從前。人口加有什伯。兼以俗尚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御史舒赫德：〈八旗開墾邊地

				十一戶政賦役三》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四治體八臣職》	疏乾隆二年〉《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戶政十八旗生計》
1888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	187萬	頻度：73 「耳其北連丹馬瑞典瑙威諸國四鄰環視約縱連橫而德則屹然稱雄于其間設非君臣勵精圖治孜孜焉以求**自強**之道」馮國士：〈德國陸軍槍隊操法序〉《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九洋務九軍政中》	頻度：35 「諭旨派員查勘並議辦法臣等查閱李鴻章所奏章程十六條頗為詳明竊思英之新金山美之舊金山俄之悉畢爾莫不淘挖金礦以為**富強**之計」唐炯：〈遵議漠河金廠開辦事宜疏總署王大臣〉《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六戶政三理財下》	頻度：29 「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學術二儒行》	頻度：86 「鄉里各謀**生計**遇有調遣或製造鍋帳或整理器械或安頓家口或雇倩頂替非數日不能成行軍情」湖南巡撫卞寶第：〈謹陳酌改營制藉節餉需管見疏〉《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四兵政三兵制下》
1897	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編續編》	334萬	頻度：40 「中國與泰西交涉以來．見其鐵艦輪船槍之利．設廠製造以圖**自強**」趙元益：〈備荒說〉《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四戶政十六荒政上》	頻度：35 「聞歐洲各國．以商務為本．上下一心．盡力保護．並設商務大臣專理其事．立有商埠要區．俱設領事．屯泊兵船．以資翼而壯聲威．	頻度：49 「葉氏以**經濟**自負．讀其集而約其恉．在先去冗兵以給國用耳．而其言卒不可盡用．馬氏推信葉氏．于終論亦復不錄．知其言之	頻度：139 「蘇省被難以來．弁丁輾轉流離．無復生計．一經克復．勢且環求調劑．安得閑款給此閑人．若不及今裁汰．直為國家一大累矣．」

				所以商民踴躍．日臻富強．」趙元益:〈備荒說〉《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四戶政十六荒政上》	有弊矣. 信乎經濟之難言也．」黃式三:〈讀兵考〉《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五兵政一兵制上》	馮桂芬：〈裁衛屯議〉《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七戶政十九漕運上》
1901	邵之棠編：《皇朝經世文統編》	389萬	頻度：286 「從來治國者欲求自強必先求自富目前中國之天下西北則宜加意于農務東南則宜留心于商務而商務之中尤莫利于鐵與棉花」佚名：〈采煉鋼鐵紡紗織布議〉《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二考工部六紡織》	頻度：507 「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論必不能富強于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止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所不解」佚名:〈白門原約二則中西紀事〉《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四十七外交部二通商》	頻度：97 「朝廷既欲特開經濟之科簡拔真才將見風行草野抱才之士不致委棄好學之士得所率循人才固無虞不振矣惟人才」佚名：〈興礦務以開利源論〉《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十九考工部三礦務》	頻度：164 「吾知自此而後河南礦務必將日異月新局中煉鋼之盛必更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而且可以添增無數工人于小民生計更為大有裨益誠所謂一舉而數善備焉」佚名：〈論中國製造日精〉《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十八考工部二製造》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 廣大儒生驚覺中國已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即如果不把建立現代國家放在首位, 就有亡國亡種的危機。這時, 中國傳統社會組織藍圖首次受到衝擊。要成為一個能抵禦西方衝擊的現代國家, 就必須富國強兵, 學習西方現代工業, 發展商品經濟, 這些思想開始成為社會共識。在這種新的思想視野中, 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找到某一個詞代替「富強」來指涉economy。十分有意思的是, 甲午以後, 有相當多士大夫, 無論是激進改革派還是后黨中穩健派都開始用「經濟」

作為economy的譯名。這一方面是甲午後中國人重視學日本經驗；另一方面，從思想觀念轉變來看，也意味著與economy有關的學問，到這時才進入包含社會組織原則的意識型態層面。

據我們現有文獻查證，譚嗣同在一八九六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各國經濟家」的活動，說他們為了向外國爭商務，所以不可能均貧富。但在譚嗣同看來，最終要返到均貧富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儒家經世思想來解讀西方各國經濟家的活動，而不是從求利來分析的。[38]這裡「經濟家」雖還有傳統經世的含義，但現代色彩已相當明顯了，現在我們還無法判別譚嗣同這種用法是否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但是只要讓我們再看看洋務重臣張之洞是如何使用「經濟」一詞的，就可以發現中國文化本身亦存在用「經濟」指涉economy的內在資源。張之洞在《勸學篇．變科舉第八》中頻頻論證「經濟」，文中這樣寫道：「近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接著，他針對時弊，談到科舉制度改革，他將「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稱為「中學經濟」，而將「西方各國政治、兵制、學校、財賦、商務」等統稱為「西學經濟」。張之洞認為只要注重這兩方面經濟人才，科舉制就能全面更新。他將此項建議比作當年歐陽文忠以策論代詩賦，謂「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39]

明清以來儒者在對學問分類時，「經濟」有時和「學術」並列，「經濟」包括經學和天道等內容，「學術」則為器物衣食等日用。有時以「經濟」與「經學」作為二門。[40]也許，張之洞這種「中學經濟」、「西學

38 一八九六年譚嗣同在〈報唐才常書〉曾這樣寫道：「環地球各國之經濟家，朝夕皇皇然，孜孜然，講求處置此事之法，而卒莫得其要領。以目前而論，貧富萬無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貧富均，無復大有力者出而與外國爭商務，亦無復貧者肯效死力，國勢頓弱矣。然無論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極盛之時，終須到均貧富地步，始足為地球之一法。故嗣同於此礦，不欲令一二家壟斷其利，亦不欲分入於官而歸諸一縣之公事，亦隱寓均貧富意矣。足下所擬辦法，不知與嗣同同否？」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250。

39 張之洞，《勸學篇》二，9749~9750。

4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明張雲鸞撰。雲鸞字羽臣，號泰岩，無錫人。崇禎初嘗以

經濟」的用法不一定是來自日本，而是對明清以來儒學中「經濟」這個詞意義的創造性發揮。因為，張之洞所謂的「經濟」仍然是指經世濟民之學和相應的治國才幹；雖然尚沒有脫離傳統的意義框架，但他已意識到傳統經世濟民之學已無法包容富強和學習通曉西方事務，他就用了「西學經濟」這一說法。這個詞組中的「西學」，也就是他那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的「西學」。這一思想已隱含著把儒家倫理和西方價值分割為兩個層面的萌芽。[41]在張之洞看來，在西方文明衝擊下，中國社會依然是根據儒家倫常道德組織起來的，綱常名教是清廷統治的合法性基礎，而有為的儒臣要在當時的大變局之下施展經世濟民抱負，就必須具有中西兼通的知識技能的治國才幹，也即精通「西學經濟」。這樣，「經濟」一詞從擴大了的經世才能轉化為指涉西方經濟事務，最後涵蓋了economy的各項內容。

其實，只要有意識地改變儒家意識型態的社會組織原則，即可使economy進入經世濟民的視野。康有為提出的三世說，在社會組織原則上強調上下、君民相「通」。在這種由儒學創造性轉化而來的社會組織原則中，經世濟民應包括economy。但康有為本人並沒有用「經濟」一

所輯《經書講義》獻之闕下。此編復取五經及《周禮》、《孝經》之語，分門排比，共為七十二類，釐上下二集。自跋謂大要不外經濟、學術兩端，上集為經濟，下集為學術。其目次，以天道、地道、君德、臣德、聖學等為經濟，而以衣服、飲食、器用、宮室、草木、鳥獸等皆入之學術。未為允協。然雲鸞此書，不過為舉業之用，本不為經義立言，亦無足深論。今退置類書類中，庶核其實焉。」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四部精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138，《五經總類》提要，661上。這種將學問分類的作法似乎相當普遍，例如同卷《古今好議論》提要又云：「明呂一經編。一經字子傳，號非庵，吳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是書輯漢、唐以下迄於明季諸儒議論，分經學、經濟二門。經學為類二十有二，經濟為類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則，蓋以備場屋策論之用者也。」（同上）

41 長期以來，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被簡單地理解為用「體用」關係來分中西。實際上張之洞明確指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張之洞全集》，第12冊，9796。這裏把「內」和「外」、「道德」與「富國強兵」分成兩個層面，與體用具有的一元論結構是不同的。

詞指涉economy，[42]仍保持洋務時期將其稱為「富強」的用法。[43]而梁啟超於一八九八年在〈讀孟子界說〉一文中，有這樣的論證：「孟子言井田，為大同之綱領。井田之意，真治天下第一義矣。故孟子一切經濟皆從此出。」[44]這裏「經濟」雖然仍是沿用傳統用法，但他已把「經濟」提高到「治天下第一義」，而且是實現大同理想的方法。梁啟超對「經濟」一詞的這種用法，代表了改革派用今文經學的公羊春秋重構社會組織原則的嘗試。也許，正是這種修改傳統「經濟」一詞背後道德價值內容的做法，使得日後知識分子接受日本用「經濟」譯economy。一八九九年，梁啟超更將「經濟」及「競爭」提到時代的高度：「二十世紀，為經濟上競爭革命之時代」，但他同時認為，「而經濟上競爭之大權，實握於勞力工人之手」。[45]這裏，「經濟」一詞背後的大同價值已開始指向提倡勞工階層掌握經濟大權的社會主義了。

五、「民生主義」和「經濟學」

為了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用甚麼新名詞來指涉economy與他們心目

42 一八九七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這樣論述：「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捨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勞臣所百慮而莫易。」見翦伯贊、劉啟戈等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5），第2冊。這裡，康有為是把主張變法的人稱為「經濟者」，這樣關於economy內容，當然只能仍用富強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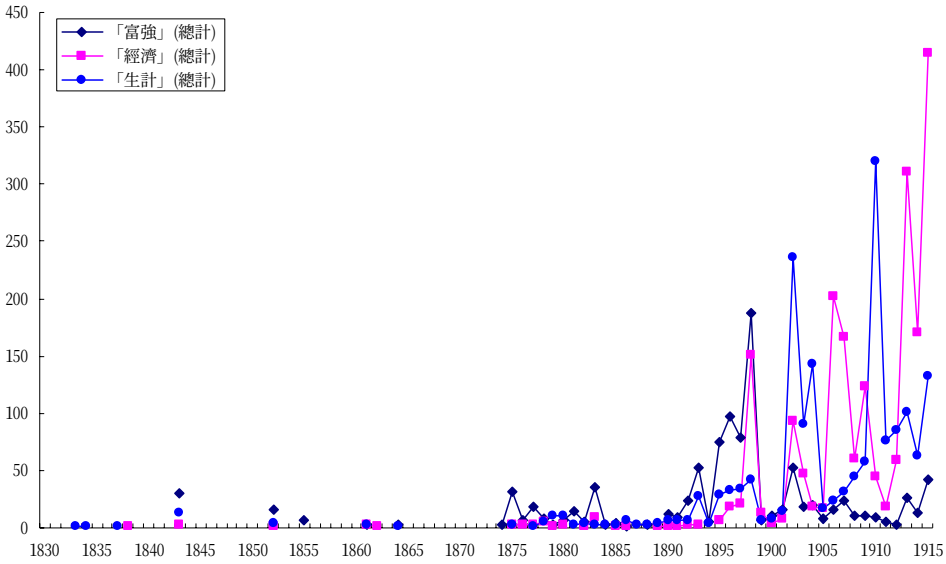
43 一八九一年，何啟、胡禮垣在批判康有為變法理論時曾這樣說：「今或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為經濟，西學為富強，皆於其理有未明也」見何啟、胡禮垣，〈康說書後〉，收入鄭大華點校，《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270。顯然，這段話是針對張之洞、鄭觀應和康有為三人的。何啟、胡禮垣對西方現代社會組織原則比張之洞、康有為有更深的認識。他們不同意用傳統「經濟」觀創造性解釋來涵蓋economy，也不同意用「富強」來表達economy。

44 梁啟超，〈讀孟子界說〉，收入《飲冰室合集》，第2冊，文集之三，19。

45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飲冰室合集》，第2冊，文集之三，53。

中社會組織原則的關聯，僅僅考察個別人如何翻譯economy是不夠的，為此我們需要去統計不同歷史時期人們普遍使用的術語。

圖一：「富強」、「經濟」和「生計」三個詞的使用頻度分佈（1833~1915）



圖一為我們根據數據庫一得到的自一八三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有關「富強」、「經濟」和「生計」三個詞頻度統計。[46]從圖一可見，戊戌之前「富強」一詞使用的頻度遠高於「經濟」，自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經濟」一詞使用頻度急增，終於在戊戌變法期間和「富強」相當，並在一九〇二年後迅速超過「富強」。這表明當士大夫所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為儒家意識型態所規定時，人們普遍用「富強」來指涉西方economy有關的活動，富強是一種與儒學經世濟民不矛盾的國家政策。

46 該統計由數據庫一得出，由於諸種《經世文編》中一些文章年代尚未確定，故在表一中有關這幾個詞的頻度並未在圖一中標出。

那麼，一旦儒家意織型態受到普遍質疑，使用與社會組織原則有關的「經濟」一詞來指涉economy，就可以作為這種思想大轉向的語言學證據；也正是在思想轉向背景下，經濟學開始興起。

具體分析立憲派和革命派在接受「經濟」所代表新觀念的不同途徑，可以進一步理解為甚麼當時會採用「經濟」來指涉economy。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使清廷意識到利用「人民戰爭」抵抗西方衝擊的虛妄；為了保國、保種、保教，中國就必須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而在儒家意識型態——宋明理學中，宇宙論和社會制度都是以儒家倫理為中心的，現在既要引進西方價值，又要維護清廷和儒臣統治權力合法性基礎——儒家倫理，唯一的辦法是採取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的將西學與中學劃分為兩個不相同的領域的辦法：[47]儒家綱常名教屬於中學是「體」，西學是「用」，學習西方不能損害中學這個「體」。上述中學西學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型態，是清廷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的思想基礎。在中西二分的意識型態中，經濟也相應分成中學經濟和西學經濟兩個部分。在某種意義上說，張之洞的思想代表了一九〇〇年後清廷和立憲派的觀念。立憲派用經濟指涉economy來自於張之洞的「西學經濟」。

一九〇一年清廷宣布開設「經濟特科」，選拔具有「中學經濟」和「西學經濟」兩方面才幹的儒生。[48]「西學經濟」的內容極廣，為甚麼最後「經濟」這個詞會作為economy的代名詞呢？原因在於推行新政必然導致很多學科從「西學經濟」中分化出來。例如人們很快發現，屬於

47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347、373、232~234。

48 一八九八年，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一月廿七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庚庚寅）定經濟特科及歲舉法，命中外保薦堪與特科者。七月十三日，命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撫、學政舉堪與經濟特科者。十月九日，懿旨復鄉、會試及歲、科考舊制，罷經濟特科。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復詔開經濟特科，命中外舉堪與試者。一九〇三年七月十日，御試經濟特科人員於保和殿（參《清史稿．德宗本紀》有關各條）。中國近現代一些著名政治家、文人、實業家如張謇、孫詒讓、羅振玉、繆荃孫、梁士詒、楊度、張一麐等，大都與經濟特科有關。參見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63），1173、1184。

傳統科舉變種的「經濟特科」，並不能解決現代化急需的大量人才問題。在袁世凱等人建議之下，清廷不得不廢科舉，從新學堂和在西方留學生中選拔官吏。這樣，新式學堂、西式練兵等就從「西學經濟」中劃分出來。隨著人們普遍接受中學與西學互不干擾的二元論觀念，那些和中學明顯無關的事務也就不斷從廣義的「經世濟民」中擺脫出來。這一時期，大量翻譯西方科學和政治、經濟著作，很多往往是從日文轉譯的。西方科學長時間被歸為「格致」，而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型態中，再把有關自然現象的學問歸為「修、齊、治、平」八條目中就顯得十分可笑了。一九〇二年左右，「格致」一詞終於被指涉分科之學的「科學」一詞取代，「科學」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漢語最重要的術語。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爆發，清廷和廣大儒臣目睹俄國輸給日本，在他們的觀念中，這是君主制不敵君主立憲制的鐵證。隨著預備立憲成為清廷政治改革的目標，西方政治學和憲法也成為必須專門考察的項目，它們與中學關係都不大。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背景。本來「經濟」經創造性詮釋後，包括了「整肅吏治、改科舉、辦學堂、練新軍、譯西書、整頓稅制、節財政、鼓勵工商」這些內容，用今天的話講，可以歸為「政治改革、軍事改革、經濟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五大類。到一九〇五年新政期間，政治、軍事、教育和科技四大類都變成與中學沒有甚麼關係的西學，從廣義的「經濟」中獨立出去，這樣就只剩下「理財、稅收、節用、獎勵工商業」等屬於「經濟」的一類了。當然，嚴格說來「設電線、建鐵路、辦私人公司」等現代經濟活動也屬於西方新事物，與中學無甚關係，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類社會公益經濟事務一向也屬於「經世濟民」的一部分。例如當年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時，屬於今天我們所謂經濟類的文章（如戶政和工政）多達九百零九篇，佔總篇數的百分之四十，[49]它們從來是「經世」的主要內容。也就是說，在二元論意識型態中，現代工商和廣義的「經世濟民」已經形成某種對應關係，很難與儒家倫理組織社會的基本藍圖脫離關係。這樣，隨著二

49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8~9。

元論意識型態的普及和現代化的推行，「經世濟民」涵含內容不斷狹窄化，最後只用於指涉economy了。

上述分析，是討論中西二分的的意識型態中「經世濟民」內涵的專門化，導致採用「經濟」來翻譯economy，它刻劃了清廷和儒臣紳商這些社會中堅人士的觀念轉變。而激進知識分子則是順應另一種方向，即改變「經濟」的道德內容來指涉economy。表面上看，戊戌後海外流亡知識分子和反清革命團體主要是採用了日本的翻譯，用「經濟」指涉economy，似乎完全由於使用上的方便。但如果我們去分析這些流亡知識分子和革命團體的經濟觀，也就是他們接受「經濟」這一詞的意義結構，就可以發現其道德內涵的變化。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譚嗣同，最先使用「經濟家」一詞，此後激進知識分子頻頻使用「經濟」一詞，與譚嗣同一脈相承，他們大多也是主張破除倫常等級，嚮往平等和大同道德境界。

這不是個別現象，在一九〇五年「經濟」一詞普及之前，其引用場合大多都同推崇分配平等這一價值直接相關。如前所述，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期間就用「大同」來解釋孟子的井田，並把它作為「經濟」背後的價值。一九〇一年他在《清議報》更明確提出：「二十世紀之三大問題有三：一為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為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為調和經濟革命之問題。」並對「經濟革命」特別作了注解：「曰貧富不均所引起之革命，日本人譯為經濟革命。」[50]雨塵子主張「平等」用於「人的生計」，就是反對資本家的「經濟革命」，即「經濟社會，非以多勞動者，供少數資本家之使役乎？」[51]而用平等價值考察國與國關係，就是指控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謂「帝國主義者，因經濟之競爭而行於列國也」。[52]在這些例句中，「經濟」這個詞已無「經世濟民」傳統道德內涵，似乎是中性詞彙，用於指涉西方現代經濟觀，但同樣包含著把分配平等作為理想經濟制度的新價值取向。這正如清末革命派使用「社會」和「社會主義」這兩詞具有某種關係一樣。據我們檢索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流

50 梁啟超，〈本館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期。
51 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28期。
52 雨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1、14期。

亡知識分子和反清革命團體所報的報刊，可以發現「經濟」和「社會」兩個詞幾乎是同時出現並廣泛流行的。我們曾在有關論文中分析過，「社會」這個詞是在一九〇二年反清革命思潮興起時盛行，一開始傳入就與嚮往平等的社會主義有關，甚至「社會」一詞有時就用於表達「社會主義」。[53]革命派知識分子接受日譯名詞「經濟」也大致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用民生主義來解決「經濟」問題，他指出：「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同。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擅揚時代也。」[54]從此，「經濟」一詞的使用與有關「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的論述密切相聯，頻頻出現在《民報》的各種議論之中。這說明，如果我們看到代表革命派社會觀的「社會」一詞具有「社會主義」價值取向，那麼，代表革命派經濟觀的「經濟」一詞的價值，也可以說是「民生主義」。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無論是清廷和辦新政的紳士用「經濟」一詞指涉現代工商，還是革命派接受日本用「經濟」翻譯economy，二者的價值取向雖然完全不同，但其背後有著共同的思維模式，這就是道德仍然作為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則，這正表明二者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的制約。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們將會指出即使儒家意識型態轉型甚至解體，這種把社會生計和分配視為道德延長的思維模式仍然存在，制約著二十世紀中國對經濟活動的定位。

六、紳士公共空間和「生計學」

人們或許會問：在中學西學二分的意識型態中，與economy有關的

53 例如當時有這樣的論述：「昔者外國工人，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我國有之乎？」〈說國民〉，《國民報》2期，1901年6月1日。進一步討論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54 孫文，〈發刊詞〉，《民報》，第1期，1905年10月。

活動大多屬於與儒家倫理無關的西學，那麼將西方economy仍歸為擴大了的經世濟民，使用「經濟」一詞只不過是語言學的歷史慣性，似乎和推行新政士大夫信奉的社會組織原則沒有緊密的聯繫。必須注意，在中西二分的意識型態中，社會組織原則也根據中學和西學分裂為不同型態。儒家意識型態（中學）維護著紳士在家族內的權力和原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故在家族內部以及舊有社會組織構架中，社會組織原則仍為儒家倫理所主導，這樣，家族生意和城市化紳士辦公司這類活動稱為經濟是無可非議的；而在家族和原有權力關係之外的公共領域，社會組織原則由西學規定。這時社會組織原則可以有兩種取向：一種仍是基於道德（它是不同於儒家倫理的公德），另一種是基於法律和契約。第二種取向十分類似於西方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在第二種傾向支配下，有關社會分工、現代市場制度研究的學問就不能歸為作為道德延長的「經濟學」。

我們曾提出一九〇〇年後正是中學西學二分的意識型態的形成，促使清廷和城市化紳士一面在家族內部和原有社會整合架構中堅持儒家倫理，而在公共領域引進現代市場經濟和西方政治制度，中國出現了公共空間。我們將這種以家族為單元的公共空間稱為紳士公共空間。[55]在紳士公共空間的實踐中，大多數城市化紳士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是公德，將道德作為社會組織原則使得economy仍被譯為「經濟」。但正如我們曾討論過的，當時作為公德的公理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上，個人權利是公德的重要內容；[56]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語境中，個人爭權利體現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它不屬於道德範疇。[57]當時，紳士公共空間也是分為家族內外有別的兩個領域，對內仍然是儒家倫理為準則；在家族以外的領域，可以採取自由主義傾向的社會組織原則，這樣

55 金觀濤、劉青峰，〈紳士公共空間在中國〉，《二十一世紀》75期（2003，香港）。

56 金觀濤、劉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國文化「合理性」論證以及「正當性」標準的思想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10期（2001，香港）。

57 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臺北）。

和economy有關的種種活動也就和儒家道德分割開來，用「經濟」譯economy也就不合適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新政期間一些士紳將經濟學稱為「計學」。而在海外流亡知識分子和革命團體中，亦有相當多人認為合理的經濟制度同民生主義沒有甚麼關係，主張用無道德色彩的名詞來翻譯economy。隨著西方自由主義的傳入，特別是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1712~1778）《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的傳入，展現出一幅由具有天賦權利的自主之個人根據契約組成社會的社會組織藍圖，它與中國將社會看作由道德規範組成的傳統觀念根本不同。這些接受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或具有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更願意用「生計」這個中性名詞來指涉economy，用「生計學」譯「經濟學」。如前所說，嚴復因嫌經濟太籠統一直用「計學」來翻譯economics，高一涵和楊昌濟將economics稱為「生計學」。[58]直到一九一八年傅斯年仍然把economics稱為計學。[59]很多人這樣用詞，正是想力圖避免「經濟」一詞在中文裡原有的經世的道德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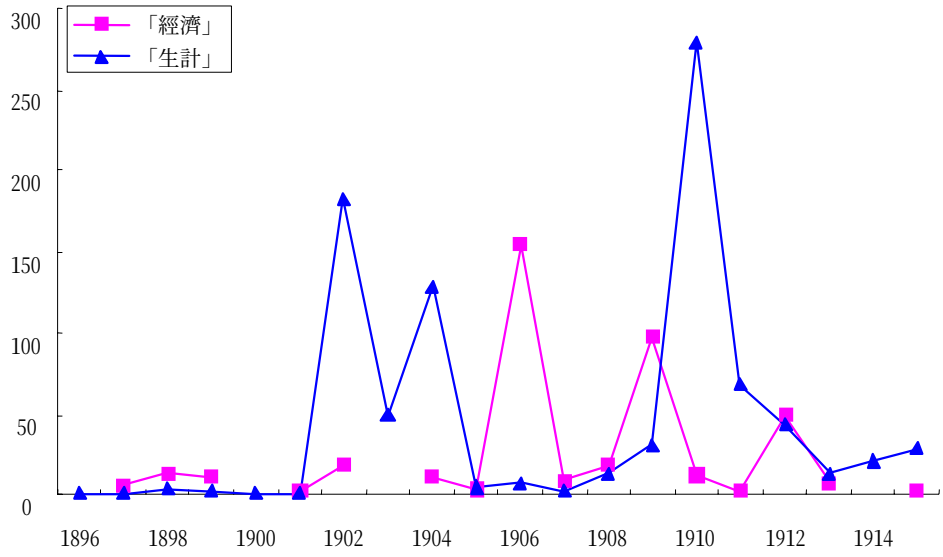
我們前面已引述，梁啟超曾用大同解釋孟子的井田制，一度採用日本翻譯而使用「經濟」一詞。但是，一九〇二年梁啟超突然放棄了用「經濟」，主張將economics譯為「生計學」，而將economy稱為「生計」，「國民經濟」被稱為「國計」、「國民生計」。但過不了多久，他又轉而採用「經濟」一詞，再後來又放棄之。整個過程反反覆覆，梁啟超的用詞似乎混亂不堪。森時彥的研究發現，梁啟超翻譯economy一詞有以下幾個階段：一九〇二年五月前為摸索期，一九〇二年五月至一九〇六年三月為使用「生計」時期，一九〇六年三月至一九一〇年二月為使用「經濟」時期，一九一〇年二月至一九一二年十月為回歸「生計」一詞

58 在《新青年》中「生計學」這個詞一共出現了十次，它們分別來自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新青年》1卷2號）、〈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新青年》1卷4號）、楊昌濟的〈治生篇〉（《新青年》2卷4號）和張國仁等的〈平民生計社宣言：附平民生計社簡章〉（《新青年》5卷5號）等數篇文章。

59 傅斯年指出：「中國學人，每不解計學上分工原理」，《新青年》4卷4號。

時期，一九一二年十月以後為「經濟」、「生計」二詞並用時期。[60]我們根據數據庫一檢索梁啟超約近千萬字文本，得到圖二。[61]由圖二驗證，森時彥對梁啟超在不同階段使用economy的中文譯名的變化，大致是成立的。而我們則可以通過統計分析認識梁啟超幾次轉變術語的原因，有助於從economy中文的翻譯角度，解析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型態所認同的公共領域社會組織原則的兩種不同思想取向。

圖二：梁啟超對「經濟」和「生計」這兩個詞的使用



梁啟超第一次轉換用詞的原因十分清楚，這就是他所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從康有為的三世說轉變為自由主義取向。自一九〇二年梁啟超承

60 森時彥，《生計學和經濟學之間——梁啟超的political economy》（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0）。

61 對比圖一、圖二，可以發現「生計」一詞主要是梁啟超使用最多，其他人大多用「經濟」或其他詞彙。圖一中「生計」的頻度，是由梁啟超文章決定的。

認個人權利意義後，他在〈盧梭學案〉一文中曾高度讚揚國家應是由具有獨立自主個人組成這一原則。[62]《新民說》是梁啟超這一段思想的代表作，表明他在這一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在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中，社會生計與道德關係不大，用「經濟」指涉economy就不合適了，這時，他大量使用「生計學」來談economics。那麼，為甚麼到一九〇六年梁啟超幾乎又完全放棄「生計學」譯名？從歷史上看，當時梁啟超與同盟會主辦的《民報》發生了中國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大論戰，他最早大量使用「經濟」這個詞的，正是〈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一文。[63]《民報》在表達土地國有化、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等主張時，經濟平等是一項重要內容。梁啟超則在反駁文章中系統闡述了不同意土地國有化和民生主義的主張。顯然，梁啟超為了辯論中雙方使用語言統一的需要而採用「經濟」一詞。但這只是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再分析一下梁啟超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六年思想變化的脈絡，則可以看到更深層的原因。就在梁啟超與《民報》辯論要不要推行民生主義之前，他曾在《新民叢報》（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八日、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發表〈開明專制論〉長文，力圖論證《民報》所主張的社會革命、民權立憲統統行不通，中國只能實行開明專制。其整個論述的根據是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不切實際（指出它從來沒有在西方社會轉型過程中推行），更無法在中國當前推行。在某種意義上講，〈開明專制論〉的發表意味著梁啟超成為一個國家主義者。我們認為，從主張甚麼樣的社會組織原則而言，這無疑意味著梁啟超回到和推行新政紳士一致的立場，即社會權力構架被認為是依靠道德精英組成，西方工商也被歸為經創造性詮釋的「經濟」。梁啟超是否因為對社會組織模式看法的改變而放棄「生計學」，並接受流行的以「經

62 此文明確肯定盧梭「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論斷，謂盧梭「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為人之具也」為「旨哉言乎」，並以其契約論為「深切著明」，「鐵案不移」。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97~110。

63 梁啟超，〈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1~59。在該文中，「經濟」一詞共出現一四三次。

濟」翻譯economy，這還須進一步證明。但梁啟超採納「經濟學」這一用法，是在發表〈開明專制論〉一文之後，恰恰反映「經濟」取代「生計」是與他思想轉變有密切關係的。

一九一〇年以後，梁啟超又放棄使用「經濟」，重新將economy譯為「生計」。這次轉折的原因十分清楚：這就是梁啟超組織政聞社，他的立憲主張與清廷再次發生分歧。這一時期，他在社會問題上的自由主義立場較為鮮明，介紹西方政黨、憲法，並從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來論證國家稅收、借款、公債和市場機制等問題，再一次影響到他對economy的譯名的使用，捨「經濟」而用「生計」。

梁啟超作為二十世紀前十年間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輿論界的言論驕子，他在不同時期交替使用「生計」或「經濟」兩個詞，可以反映以下兩個要點：第一，在中國思想劇烈變動的時期，中文詞彙使用的變化是以深刻的內在思想變化理路為根據的；第二，辛亥前，大多數從事公共空間實踐、信奉中學西學二分意識型態的紳士和士大夫，仍將公共領域的社會組織原則歸為道德（如公德），這也許是現代漢語中用「經濟」譯economy的思想史原因。

七、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組織藍圖的巨變

一九一五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所認同的社會組織藍圖。運動開始之時，最早受到衝擊和掃蕩的，正是把社會視為由儒家倫理組織起來的思想。兩千年來，科舉制是以農村戶籍為單位的，這一制度培育了在外居官的政府官員和在鄉的士紳階層，他們形成把政府運作延伸到基層的紐帶。自一九〇五年清廷廢科舉，從新學堂中選拔官吏後，數以千計的新學堂興起，成為大量培育新知識分子的生產基地。到一九一五年新文化運動發生時，新學堂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數量已遠遠超過傳統士紳，而受新式教育影響的人數迅速增長到以百萬

計。[64]新知識分子因其成長經歷與在傳統大家庭裏受教育的舊士紳不同，個人和個人獨立成為他們認同的基本價值。

「個人」這個詞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現了二五九〇次，比「科學」、「權利」、「自由」等幾個詞分別出現一千餘次的頻度都要高，[65]個人獨立更是當時響徹雲霄的口號。在個人獨立這種價值取向下，社會被設想成由獨立個人組成的組織。當時個人獨立不僅是各種文章論述的主題，也是翻譯和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根據數據庫二統計，《新青年》第一卷共有二十九萬六千字，其中與個人獨立、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有關的文章就有九萬六千字，佔了百分之三十四。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新青年》第一、二卷，高一涵寫了多篇介紹西方政治哲學的重要文章。這些政治哲學文章圍繞著一個中心：強調社會由獨立個人根據契約組成，政府國家的權力來自於自主個人自願交出的部分權利。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受到點名批判。雖然，《新青年》所提倡的自由並不等同於英美經驗主義的自由，而有道德的含義，而且盧梭的公共意志是和社會契約論一起得到廣泛認同的。但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從沒有一個時期像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如此明確地展現過。

我們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二十世紀前十年，「經濟」一詞往往有道德含義，其意義雖大多是指涉與政治、宗教文化不同的另一種社會行動類別。如《東方雜誌》一些經濟類的書籍廣告中，如日譯經濟教科書《經濟通論》，為了怕引起誤解，不得不對「經濟」一詞另作說明。[66]但

64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217~221。

65 金觀濤、劉青峰、章清，〈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8期（1999，臺北）。

66 一九〇四年《東方雜誌》推介日譯經濟教科書《經濟通論》時，在廣告上不得不加如下說明：「我云財政，日本云經濟，實同一義，是書先論經濟之綱要沿革，次論生殖，次論分配，終論消費，體用兼備。」（《東方雜誌》1卷1期）說明當時日譯「經濟」一詞，特別是作為書名，很容易使那些只知道經濟傳統含意的讀書人混淆，所以要加以說明。而到一九一五年前後，大量經濟的文章出現，介紹西方各國國力、民生種種，再也看不到類似上加說明的文字。

在新文化運動早期「經濟」一詞的內在含義，出現了某種微妙的差別，這就是「經濟」這個詞不再具有明顯的道德含義。

我們抽取了《新青年》雜誌中三千多個有關「經濟」一詞的例句，經分析它們大致可以分成十一種意義類型，分別為：「經濟獨立」、「經濟平等」、「馬克思主義經濟」、「經濟原理」、「國民經濟」、「經濟力」、「經濟領域」、「個人經濟」、「經世濟民」、「生計狀況」、「對經濟主義的批判」，而表二則是這十一種意義類型在各卷中出現的頻度。從表二明確可見，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即前五卷）中《新青年》作者使用「經濟」一詞時，他們認同的經濟觀中傳統道德文化色彩相當少。例如，其中明確指涉「經世濟民」傳統含義的只有四次，表達經濟平等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經濟觀的亦不多。這一時期，「經濟」一詞絕大多數意義是指涉人和社會的生計，或節儉以及生產能力之意，它是一個有別於「政治、文化、宗教」的另一種社會行動類別。這說明，雖然甲午後用「經濟」指涉economy，是由於士大夫將道德作為社會組織原則，但即使這種翻譯被人們普遍接受，只要社會組織原則變化，原有譯名的意義也必定不同了。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經濟」一詞與道德脫離關係，具備了今中文裏「經濟」這個詞的基本內涵。

值得注意的是，正當新知識分子認同自由主義社會組織原則不久，經濟決定論也開始興起了，它代表著新文化運動中社會主流思潮的轉向。一般認為，這是因為當時是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大規模傳入中國。從表二可見，一九一九年以後即《新青年》第六卷開始，「經濟」一詞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觀的文章中。毫無疑問，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促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但我們從思想史內部分析就應該看到，經濟決定論的興起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這樣，我們自然可以進一步追問：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究竟和他們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變遷有沒有關係？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一直被忽略。本文第三節曾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在西方興起的思想史過程，其重要原因是廣大勞動人民在市場社會無法維持生計，它導致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批判及否定。那麼，新文化運動中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思想過程呢？

表二：《新青年》雜誌中使用「經濟」一詞論述的十一種意義類型*

意義 / 時段	經濟獨立與個人、國家經濟獨立有關(包括經濟不獨立、奴隸經濟等項)	經濟平等 社會經濟平等,與分配、勞工待遇有關（包括經濟不平等、經濟侵略、壓迫、殖民地經濟）	馬克思主義經濟			經濟原理（包括個人、組織、社會的經濟行為是否合理划算）	國民經濟（包括國家、政府的經濟行為，如政策、計畫等，與國家獨立、強大發展有關）	經濟力（經濟能力、勢力、動力、國力、生產力、物力……，包括競爭、互助合作	經濟領域	個人經濟（自由主義經濟、私有經濟）	經(世)濟(民)的思想、能力等	社會經濟生活狀況（個人、群體、家庭生活的狀況及經濟關係	對「經濟主義」和「經濟派的批判」	共計
			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資本主義經濟分析、批判	社會主義經濟									
卷一 1915.9~1916.2	1	6	0	0	0	0	4	0	31	1	0	6	0	49
卷二 1916.9~1917.2	10	3	0	0	0	2	11	7	23	0	3	3	0	62
卷三 1917.3~1917.8	4	5	0	0	0	13	0	3	14	0	0	7	0	46
卷四 1918.1~1918.6	6	0	0	0	0	21	0	0	11	0	0	23	0	61
卷五 1918.7~1918.12	5	5	7	3	3	19	2	0	15	0	1	9	0	69
卷六 1919.1~1919.11	4	11	220	71	3	48	16	18	31	0	1	57	0	480
卷七 1919.12~1920.5	38	43	48	21	18	31	47	48	98	15	0	65	0	472
卷八 1920.9~1921.4	14	29	40	13	79	19	38	57	51	6	0	37	0	383
卷九 1921.5~1922.7	22	25	168	22	79	10	48	26	37	8	0	55	0	500
季刊 1923.6~1924.12	13	34	155	106	214	9	49	22	85	3	0	114	12	816
不定期刊 1925.4~1926.7	8	21	72	131	315	21	43	38	47	4	0	119	15	834

*表二為戚立煌先生作出。戚先生不幸於二〇〇三年八月去世，在此說明並致哀。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視為西方現代社會危機的思想產物，那麼中國接受馬列主義的過程，則就可以歸為對於由清末新政開啟的社會現代轉型失敗的反思。從政治實踐看，袁世凱稱帝是學習西方共和政體失敗之象徵；從經濟上看，二十世紀前十年現代經濟的高速成長，到一九一九年前後，嚴重的貧富分配不均問題，城鄉以及沿海和內地的貧富對比懸殊，由此帶來嚴重的社會整合問題。更重要的是，由於紳士城市化致使中國傳統社會三層次組織結構發生斷裂，農村隨著社會精英的退出而逐漸失序；地主在農村擁有的資金財富也流向城市，造成了城鄉的斷裂和農村的日益貧困化。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國已淪為飢餓之邦。[67]新文化運動後期，不僅工農大眾無法維持生計，日益增多的知識分子也碰到生計困難。正如十九世紀西方工人的生計困境促使理論家反思個人自主性是否失去意義一樣，中國也出現了類似於西方十九世紀發生過的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否定。其表現是《新青年》由法國式啟蒙思想轉向馬克思經濟決定論。十分有趣的是，用「經濟」譯economy的過程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對社會組織原則的認識，分析新文化運動中「經濟」一詞使用的語境，同樣可以有助於找到人們所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變遷的證據。

八、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前提之一：共和的失敗和對民主的再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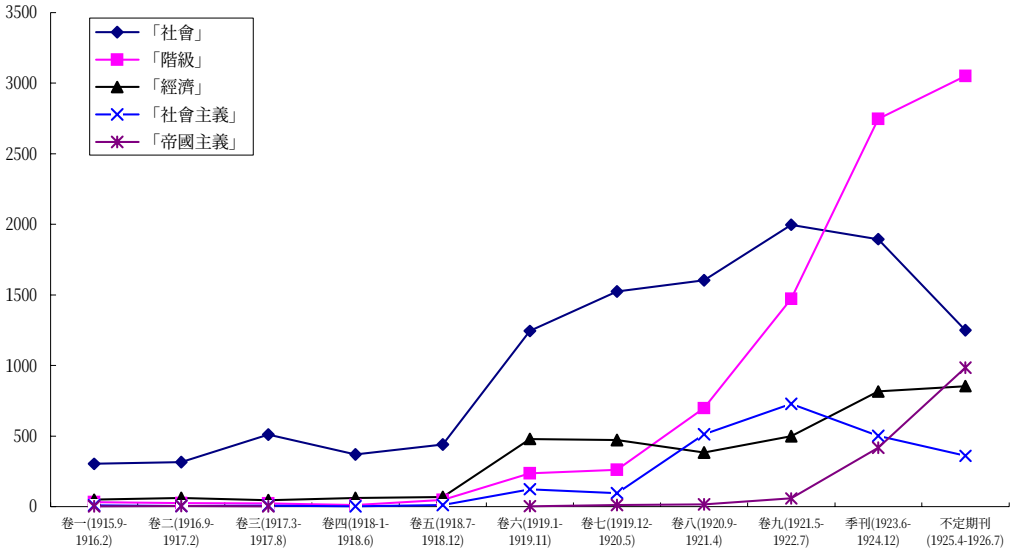
我們統計了《新青年》這一新文化運動其間最有代表性的刊物中，「經濟」、「社會」、「社會主義」、「階級」、「帝國主義」這五個詞在各卷的分布（圖三），得到了有趣的發現。首先，從圖三可見，一九一九年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將《新青年》雜誌分為兩大階段。一九一九年前的五卷，上述五個詞的使用頻度都不高，而且除「社會」外，

67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207。

其餘的詞頻度變化不大。《新青年》思想轉向後，即一九一九年後的六卷，不僅這五個詞頻度大為增高，而且變化幅度也極大。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帝國主義」一詞的使用。雖然《新青年》創刊時一戰已爆發，但「帝國主義」一詞使用一直相當少。直到一九一九年後，特別是《新青年》變為共產黨機關刊物之後，這個詞的使用才迅速增加。這表明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主要是在巴黎和會後，特別是在接受了列寧帝國主義論之後。

新文化運動早期「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和「階級」這三個詞在《新青年》使用頻度不高，正好說明當時社會主義思潮並無太大影響，知識分子大多認同類似於自由主義的社會組織原則。「經濟」一詞在《新青年》雜誌中的頻度變化，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前五卷），該詞使用頻度很少；第二個時期為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一年四月（第六、七、八卷），它是「經濟」出現頻度第一個高峰之呈現；第三階段為一九二一年五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是使用「經濟」一詞的第二個高峰。再對照表二，可以看到「經濟」一詞在這三個時期使用時上下文的意義也有明顯不同。第一個時期談「經濟」時大多指一個與政治、文化不同的領域。而在第二個時期用「經濟」一詞時，有三〇八次是在討論歷史唯物論時出現的，其中用於批判資本主義經濟有一〇五次，談社會主義經濟一〇〇次。特別在第六卷，和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的達二二〇次，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到第三個時期，用「經濟」一詞時，其批判資本主義、鼓吹社會主義的頻度（867次）大大超過歷史唯物論（395次）。我們認為，這三個階段（兩個高峰）正好刻劃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是如何傳入的，揭示了否定現代社會組織原則與經濟決定論興起的關係。

圖三：《新青年》各卷「經濟」、「社會」、「階級」等關鍵詞使用頻度變化（根據數據庫二）



我們先來看第一階段。如前所說，第一階段知識分子主要認同法國啟蒙思想，經濟決定論尚未興起。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介紹西方唯物論卻是《新青年》前五卷中的重要內容，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與唯物論並存。前五卷中大力翻譯和介紹海克爾（Haeckel, Ernst, 1834~1919）《宇宙之謎》（*Riddle of the Universe at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00*），我們曾論證過它與中國近代傳統中氣論有著深層聯繫。[68] 因此，我們應該重視以下兩個重要觀點，第一，中國現代唯物主義並不是完全從西方傳入的，自明清以來的近代傳統發揮了潛在的巨大作用；第二，唯物論並不一定邏輯地指向唯物史觀。長期以來，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把經濟決定論等同於唯物史觀，唯物史觀來自唯物論；即經濟決定論被歸為某種物質決定論。但從《新青年》前五卷所反映的中國歷史經

68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346~355。

驗來看，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並不一定是將唯物主義用於歷史研究的必然結果。五四時期中國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也認同物質世界觀，是唯物論的信徒，但他們一直拒絕唯物史觀。這說明，唯物論必須與另一個要素結合，才能導致唯物史觀，這就是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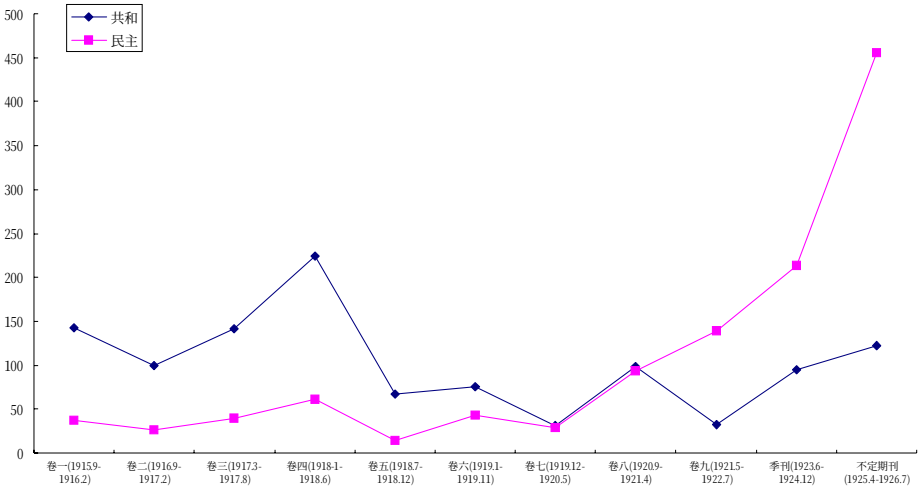
新文化運動中，最先衝擊自由主義社會組織藍圖的是引入西方共和主義的失敗。圖四為《新青年》雜誌中共和、民主觀念（它包括「民主」、「民治」和「德先生」等有關民主的詞彙）頻度統計。《新青年》前五卷「共和」多於「民主」，一九一九年正好是「共和」衰落、「民主」興起的轉折點。如前所說，共和一直為民初城市化紳士所提倡，共和主義因強調參政者的精英資格，一直具有精英政治色彩，它與紳士公共空間繁榮同步，而民初政局日益混亂意味著引進西方共和主義的失敗。其後果是導致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懷疑。我們曾論證過，「民主」取代「共和」不僅意味著民主與共和的對立，也是重新界定民主的含義。[69] 圖四中民主使用的三個高峰刻劃了民主意義的變化。「民主」在第一個高峰的主要意義是同「君主」對立，代表了西方代議制政治。在一九一九年後的第二個高峰中，民主的主要意義不再是西方制政治制度，而其內容多是「民治主義」甚至是「工人政治」；這表明平等成為《新青年》知識群體最普遍的道德追求。「民主」第三個高峰出現的時間和「經濟」第二個高峰同時，這時民主的主要含義已是批判資產階級，主張無產階級民主專政了。這無疑證明，引進西方共和主義失敗後，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完全改變了對民主價值內涵的認識，原代表西方代議制政治制度的「民主」，通過第二、第三個高峰變為以平等為主導的民治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70]否定西方現代社會組織原則，這一點在對民主的再定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一九年為新知識分子放棄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關鍵性年代，認同經濟決定論的條件成熟了。

---

69 金觀濤、劉青峰，〈從共和到民主：中國對西方近現代民主觀念的選擇性吸收和重構（1840~1924）〉（未刊）。

70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56期（1999，香港）。

圖四：共和與民主兩個觀念在《新青年》出現的頻度



九、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前提之二：社會生計困境和工讀互助團的失敗

一九一九年後的《新青年》雜誌第六、七、八三卷（第二階段）恰恰存在著「經濟」一詞使用的第一個高峰。分析這三卷中「經濟」一詞出現的上下文，表明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大多是在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時使用「經濟」一詞的。我們知道，馬克思經濟決定論包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兩個部分。我們再對照表一，可以看到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使用「經濟」一詞時，主要限於討論唯物史觀，而不是剩餘價值論。這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是先接受唯物史觀，到第三階段才認同剩餘價值論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看看李大釗是如何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中國近代系統評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著名文獻。在該文中，李大釗全盤肯定唯物史觀，對剩餘價值說卻持懷疑態度。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矛盾。他這樣寫道：

> 昂格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說，這個矛盾，Ricado 已經看出而未能解釋，Rodbertus 也曾注意而未能解決，至於馬氏，在他的經濟學批評裏，已經解決過這個問題，而在資本論第三卷始完全以解答。故解釋「平均利潤率的謎」在馬氏書中是一個最著名的點，而因為解釋此謎的原故，把他的「勞工價值論」幾乎根本推翻。他的學說本身，發生一絕大矛盾，故又是一個最大弱點。[71]

為了揭示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的內在矛盾，李大釗分析了「平均利潤率之謎」。最後他得到結論：

> 由馬氏的平均利潤率論看起來，他所說的生產價格——就是實際賣價——和他所說的價值全非同物。但於價值以外，又有一種實際賣價，為供求競爭的關係所支配，與生產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結果又與一般經濟學者所主張的競爭價值論有甚麼區別？物品的實際價值既為競爭所支配，那勞工價值論就有根本動搖，基礎一有動搖，學說全體為之震撼。這究不能不算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大遺憾。[72]

令人驚奇不已的是，自一九二二年之後，再也沒有人重視李大釗發現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三卷和第一卷存在著自我矛盾的論斷。李大釗的思想說明，中國新知識分子在第二階段只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的唯物史觀部分，而對剩餘價值論尚有懷疑。另外，比較圖三《新青年》雜誌中「經濟」和「社會主義」兩個詞的頻度，第七卷「經濟」一詞出現第一個使用高峰，但這一卷「社會主義」一詞使用頻度卻比第六卷少，處於相對低谷。這表明，當時討論「經濟」文字所肯定的主流價值並不意味著接受社會主義分配原則。

西方和俄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時，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論是互相關聯、同步的。而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表明，當社會生計危機尚未被普遍意識到時，人們可以只接受唯物史觀，而對剩餘價值論持保留態度。這進一步為唯物史觀在某種程度上是價值中立這一觀點提供

71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新青年》6卷6號（1919，上海），616、619。
72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616、619。

了證據。事實上，如果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缺乏剩餘價值說，它就無法對當今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有力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也不可能轉化為社會改造力量。

事實上，在中國如果激進知識分子對剩餘價值論持懷疑態度的話，它就很難與唯物史觀相結合。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第二階段，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出現社會普遍生計危機，受到新知識分子的關注。從表一可見，正是從第六卷開始，人們在描述社會生計狀況、家庭處境時所用「經濟」一詞大大增加。從內容上看，《新青年》第六、七、八這三卷中有關工人生計的社會調查佔了相當大的比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和平等的嚮往，促使他們重視工農群眾極為艱難困苦的生活境遇，同時西方十九世紀工人嚴重的生計問題也進入進步知識分子視野。一九二〇年三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四號，是關於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專號。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以把市場機制推到類似於自然規律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根據的，是西方社會科學家對十九世紀貧困問題的一種解釋。《新青年》出版關於人口論的專號，意味著該知識群體的理論視野拓寬到對西方十九世紀如何討論貧困問題。這是否表明，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思想界接受馬克思主義，也如西方十九世紀那樣也有著不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貧困原因的解釋而走向認同馬克思剩餘價值論類似的過程呢？

分析一九二〇年代初的社會主義大論戰，可以看知識分子是如何從探討社會生計困境，一步步走向認同剩餘價值論理論的。這場論戰由張東蓀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引起。[73]該文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貧困問題的嚴重性。張東蓀與梁啟超的立場一樣，主張用基爾特式的社會主義來改造中國，即先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然後以平等這種價值來規定社會分配原則，糾正資本主義弊病。這種見解實際上只是發現了社會的貧困和不公，但沒能回答現代化社會為甚麼會帶來貧困問題。當時，新知識分子也在熱烈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西方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社會主義討論立即引起《新青年》作者群的熱烈

73 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原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時事新報》，收入朱維錚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卷1，616。

回應，[74]接著就對貧困原因問題進行了一次觀念大清理。就當時的形勢和知識分子的知識資源而論，最能對所有有關貧困問題作出全面解答，並可以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的，似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說。

一九二一年陳獨秀在總結社會主義大論戰時，正是應用了剩餘價值論來解釋上述難題的，資本家對剩餘價值之榨取可以解釋工人的貧困，剩餘價值變為國際資本也說明了為何有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75]今天當我們讀到陳獨秀這不長的分析時，會驚嘆他對當時中國和世界形勢的解釋力，由此可以想像這種解釋對已經信仰唯物史觀知識分子的震撼。陳獨秀本人就是這批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一九二〇年前，陳獨秀雖接受唯物論，認同唯物史觀，但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自從他接受上述解釋後，立即投身到反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76]

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第六、七、八卷的思想趨勢，還揭示出知識界關注的另一個熱點，這就是討論新村運動和工讀互助團為什麼失敗。二十世紀初直到新文化運動初期，無政府主義十分盛行，青年知識分子信奉由平等、自主、自律的個人根據契約，組成社會團體乃至於自我管理社會。他們坐言起行，紛紛實踐這一組織原則，模仿日本新村運動的各種小團體和自助新村，十分活躍。研究各種青年新村和「工讀互助團」的組織章程可以發現：一方面，工讀互助團規定每個成員都是獨立自主的；但另一方面又強調，每人必須參加勞動，將其工資收入或勞動所得平均分配給其他成員。參加工讀互助團的青年過著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生活。但是，實驗的結果是所有工讀互助團都因經濟入不敷出而不能維

74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新青年》8卷4號（1920，上海）。

75 陳獨秀，〈社會主義的批評〉，《新青年》9卷3號（1921，上海）。

76 一些學者指出，陳獨秀是從一九二〇年春開始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他們提出的證據正是在這一時期陳獨秀用剩餘價值論來分析上海厚生紗廠工人的經濟狀況和指導工人運動。見郭成棠，《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132~133。

持下去。

人們不禁會問:為甚麼工讀互助團會失敗？像陳獨秀等較有社會經驗的知識分子也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一般工人和小職員都能靠自己勞動維持家計，而比他們知識更多、能力更強的青年學生卻不能？而通曉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戴季陶，在一開始就斷定工讀互助團必定失敗。根據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他指出資本家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工人的工資比他實際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要低得多，而參加工讀互助團的學生即使在單位時間中創造出較多價值，但在市場經濟中，也是無法與工人競爭的。學生被迫根據工人勞動力的市價出賣自己勞動和產品，這樣半工半讀的學生當然無法維持自己的生計。[77]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的這種解釋無懈可擊，迅速被青年學生接受。工讀互助團的失敗對五四青年產生巨大刺激，使他們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靠個人組織理想平等的小社會是行不通的，如果想使這種用獨立個人平等地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能維持下去，就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換言之，不是他們的道德理想出現問題，而是這種理想無法在不合理的現存制度中實現。正因為這種思想淵源，一九二〇年後工讀互助團的個人主義得到徹底地改造，變成共產黨組織的溫床。

十、剩餘價值說、列寧主義和唯生產力論

在圖三中，第八卷（1920.9~1921.4）「經濟」一詞出現頻度比第七卷（1920）低，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這些詞彙出現頻度都遠遠高於第七卷。它表明這一時期新村運動工讀互助團和社會主義大論戰是第八卷的重要內容，反思的結果直接指向接受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從第九卷開始，「經濟」一詞使用頻度再度出現新的高峰，這時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說成為最熱門的話題。由第九卷、季刊和不定期刊組成的第三階段，是中國新知識分子普遍接受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

77 戴季陶，〈工讀互助團與資本家的生產〉，《新青年》7卷5號（1920，上海）。

論的時期。

《新青年》第九卷內容，有關剩餘價值論的論說和介紹蘇聯計畫經濟的文字佔了極大比例。在對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中，列寧的觀點被大量引用，革命知識分子從認同馬克思主義走向接受列寧主義。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主要區別在於如下兩方面：第一，列寧根據剩餘價值說論證中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必然導致壟斷，推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和帝國主義之間世界大戰的必然性、民族解放運動的合理性；第二個要點是共產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強調列寧主義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向共產主義過渡中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

《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所辦的刊物，其宗旨是宣傳中國列寧主義政黨奪取和掌握政權的理論、方針和政策，馬克思經濟決定論所規定的社會組織藍圖開始轉化為實踐。季刊和不定期刊在用剩餘價值說論證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列寧著名論斷的同時，開始鼓吹世界革命和列寧主義政黨建黨的組織原則，對蘇聯政治和經濟作了大量介紹。由上述分析可見，在新文化運動後期，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是從批判市場不能實現公平分配開始，並以平等分配為價值核心，要來重構合理的經濟制度，然後再來論證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配合的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在行動上，則要以俄為師，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實施中央指令式的計畫經濟。這種新型社會模式，迅速取代了二十世紀頭二十年代議制政治和市場經濟，成為共產黨的行動綱領。

在蘇聯列寧主義政黨的一黨專政造就了政治學者所謂的極權主義政體，這是西方近現代史上從未有過的事物；而對於中國激進知識分子而言，建立黨國在某種意義上卻有點像回到了社會通過道德規範組成（由道德精英掌握政治權力）的大傳統。除了否定市場機制，用平等這種新道德取代傳統道德之外，社會主義背後的社會組織藍圖在深層結構上同歷代儒臣的理想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五四知識分子從認同法國式啟蒙思想的社會組織藍圖到列寧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有點像梁啟超從自由主義向「開明專制論」的退卻。只有理解到這一點，我們才能認清

為甚麼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實行新民主主義一直到七〇年代末推行改革開放前，類似於經世濟民的深層結構會再次支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觀。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經濟觀已回到中國「經世濟民」的大傳統。因為馬列主義中道德決定論是隱形的，道德決定論不表現在意識型態的內容上。

眾所周知，在意識型態上，馬列主義高度強調上層建築由經濟基礎決定，主張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決定了政治道德和文化。要改造舊中國，建立新社會，就必須先從經濟上徹底打倒舊結構建立新的經濟基礎和生產關係。但是在打倒和破壞了舊結構之後，又如何建立新的經濟分配制度呢？這時，平等這一道德價值成為經濟分配的核心。由於建立全新的經濟制度（包括分配原則），是由列寧主義政黨的國家各級官員來安排和實現的，這樣列寧主義政黨成員的利益必定捲入其中。因此，在蘇聯這種隱形的價值決定論轉化為黨對經濟利益的支配，其實行過程中造就了「新階級」，與馬克思一開始的平等原則背道而馳。在中國道德決定論有著比西方和蘇聯更為強大的傳統，隱形的道德決定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則導致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納入傳統經世濟民的基本結構。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又回到傳統社會。中國現代社會是經濟制度和政治結構、意識型態道德價值之間複雜互動的結果。我們說回到傳統經世濟民結構，只是就經濟分配和道德價值關係而言。經世濟民的現代展開使得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行為不僅與極權主義不同，也與蘇聯大相逕庭。

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後不長的一段時間，新民主主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觀，但是很快就被放棄了。因為與共產黨建立深入農村基層的超級官僚機構相一致的經濟結構，已不是新民主主義經濟，而是幹部控制農業生產和黨支部深入工廠中間的合作化和社會主義經濟。[78]此後，毛澤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這種不同於蘇聯計畫經濟的群眾運動式經濟活動，其結果是大躍進導致的災難以及意識型態對其失敗的反應把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濟分配是嚴格地根據意識型態

78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411~436。

的道德價值規定的。當時中國的分配已相當平均，但在意識型態道德價值看來，分工所導致的等級差別仍屬資產階級法權。一直要到毛澤東思想在文革後期解體，支配經濟觀的道德價值消失之後，隱形的道德決定論一下子就轉化為真正的經濟決定論。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共推行改革開放，唯生產力論成為官方意識型態。

本文不可能詳細展開中國經世濟民式的道德決定論大傳統是如何在中共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起作用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有關論文。[79]我們想指出的是，直至今天為止，現代人如何看待經濟與政治、宗教文化的關係，仍然取決於人們普遍認同的社會組織原則以及從這一藍圖來分析人的生計危機及尋找解決辦法。自由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從這一萬花筒中折射出來的圖象。而在近代中國無論是基於唯生產力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那種認為只有生產力充分發展（即首先確立市場制度不可動搖的地位使中產階級充分壯大）才能搞民主的觀點，都不過是印入中國現代人思想深處的經濟決定論的新翻版。這表明，中國對現代社會組織原則認識的歷史，自始至終都是與如何理解經濟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從「經世」到「富強」再到「經濟」和經濟決定論，正是社會組織原則變化在語言學中留下的軌跡，也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經驗證據。如何從思想史上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不僅對中國思想有意義，而且有助於認識西方自由主義和馬克思的複雜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從關鍵詞來研究中國思想史在社會科學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79 金觀濤，〈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

徵引書目

一、報紙、雜誌

1. 《民報》。
2. 《東方雜誌》。
3. 《清議報》。
4. 《新民叢報》。
5. 《新青年》。
6. 《時務報》。
7. 《知新報》。
8. 《庸言》。
9. 《甲寅》。
10. 《大中華》。

二、文集

1.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2. 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卷 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 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三、論文

1. 金觀濤、劉青峰，〈紳士公共空間在中國〉，《二十一世紀》75 期，2003，香港。
2. 金觀濤、劉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國文化「合理性」論證以及「正當性」標準的思想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 10 期，2001，香港。
3.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5 期，2000，臺北。
4.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56 期，1999，香港。
5. 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2 期，1999，臺北。
6.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8 期，1999，臺北。
7. 金觀濤，〈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收入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8. 金觀濤、劉青峰，〈從共和到民主：中國對西方近現代民主觀念的選擇性吸收和重構（1840~1924）〉（未刊）。
9. 金觀濤、劉青峰，〈從社會到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空間變遷的思想史研究〉（未刊）

四、專書

1. 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佐治芻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2.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朱泱、孫鴻敞等譯，《經濟分析史》卷 1，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3. 森時彥，《生計學和經濟學之間——梁啟超的 political economy》，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0。
4.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5.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6. 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第 12 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1998。
7. 汪輝、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
8. 劉小楓、林立偉編，《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9. 鄭觀應，《盛世危言》，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0.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何啟、胡禮垣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11.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13.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14. 郭成棠，《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15. 伊賽．柏林（Isaiah Berlin）著，趙干城、鮑世奮譯，《馬克思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16. 博蘭尼（Karl Polanyi）著，黃樹民等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17. 《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87。
18. 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9.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20.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21. 朱維錚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卷 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2. 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原富》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3.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6，臺北：正中書局，1973。
24.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25.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63。
26. 翦伯贊、劉啟戈等編，《戊戌變法》，第 2 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5。
2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
28.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62 輯，《校邠廬抗議》下卷，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67。
29. 武部善人，《太宰春台》，東京：日本歷史學會編集，1997。

From *Jingshi* to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in, Guan-tao & Liu, Qing-f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acceptance of Marxism-Leninism by analyzing the shift of the lexical meanings of the term *jingji*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The earliest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rm *jingji* is "to rule the world and govern the people" or the ability of governance. It reflects a unique economic perspective that was embraced by Confucianism. In this perspective, society is no more than but a conglomeration of people whose relationship is organized by ethical norms. Under such principl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rearrangement of society's moral order is regarded as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adoption of the term *jingji* as the translation of "economy" (it can also be viewed as the borrowing of the Japanese term *keizai*) in modern China has its root in the Confucian blueprint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in which economic order is considered to be an extension of the moral order.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5~1919),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Enlightenm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ccepted the Western liberal blueprint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ety is formed by independent individuals whose relationship is governed by contrac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uch a principl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 order has no connection with moral order. It was also in this period that the term *jingji* became detached from morals and since then began to pick up the meaning with which we are familiar today. However, at the same period, China was faced with the failur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system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common people faced impoverishment, which was touched off by the first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hat was launch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late Qing. These events acted as the catalysts of many intellectuals'

*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andon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views the society as a group of individuals formed by the new morals and norms. This is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acceptance of Marxism-Leni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 are main components of Marxism. And,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 is a derivative of the criticism of the western liberal princip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impoverishment of labor. Leninism carries the idea that society be formed by proletarian elites. This went well with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skepticism towards the Western liberal principl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is piece, we try to trace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acceptance of Marxism-Leninism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s of the term *jingji* and other relevant terms run in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especially the eleven volumes of *La Jeunesse*. We found that the rise of Marxist Economic Determinis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turn to the idea that society be formed by ethical norms.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is appeared in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represent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five volumes of *La Jeunesse* (1915~1919), in which the term *jingji* became detached from morals and the term *shehui* (society) made its debut. It was also in this stage that the liberal principle for social structure wa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failure of introducing republicanism into China. The second stage was mark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volume 6~8 of *La Jeunesse* (1919~1921). This stage saw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greeted with considerable skepticism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accepted. Also, in this stage, intellectuals became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making their livings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labor and peasants. The last three volumes of *La Jeunesse*, namely, volume 9, quarterly, and irregular issues (1921~1926) were symbols of the third stage, in which the 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Leninism prevailed. In this article, by juxtaposing the process of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acceptanc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the rise of Marxist economic determinism in the West, we tr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ey shared and review the role that deep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layed in the acceptance of Marxism-Leninism.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omparative history of ideas,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jingshi, economy.

（責任編輯：王超然　校對：林易澄　盧意寧）